

# 伊犁河谷藏传佛教寺院考察

——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圣祐寺\*\*为中心

胡方艳

伊犁河谷在准噶尔汗国和清朝统治时曾是藏传佛教信仰比较活跃的地区。准噶尔时期北疆以伊犁为中心逐渐成为藏传佛教信仰为主的地区，而南疆则以伊斯兰教为盛。清同治动乱前后，伊犁地区的信仰格局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转换。本文以昭苏圣祐寺为中心的这次考察，在梳理其扑朔迷离的历史同时也可体察这种转换过程。

**关键词：**藏传佛教 昭苏 圣祐寺

**作者** 胡方艳，1971年生，历史学博士，江苏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讲师。

## 引言

自十七世纪初以来伊犁河谷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的影响区域，在准噶尔汗国和清朝统治时期，藏传佛教曾在这里一度兴盛，及至民国而不衰。但在清同治年间动乱前后，伊犁地区在准噶尔时期逐渐形成的以北疆伊犁为中心的藏传佛教信仰为主、南疆以伊斯兰教为盛的信仰格局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转换。本文以昭苏圣祐寺为中心的这次考察，在梳理其扑朔迷离的历史同时也可体察这种转换的过程。

伊犁河谷①水草丰美、山川俊秀，自然条件绝佳，在历史上曾长期是西蒙古②的辖地。17世纪初（藏传佛教传入西蒙古比东蒙古晚几十年）土尔扈特部诺颜③赛英台奈思麦根台曼奈开始送贵族子弟到西藏跟随达赖、班禅学佛，其中内齐托音（属土尔扈特部）和咱雅班第达（属和硕特部，他是较早在准噶尔汗国传播藏传佛教的名僧之一）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格鲁派僧人。后来随着准噶尔部的强大，到巴图尔琿台吉时（1635—1653年任首领），开始在边境兴建以寺院为中心的城市，（这成为后来伊犁蒙古部族以寺院为中心建造城市与居民区的模式，一些市名与地名就源自寺院，如“金顶寺”所在的伊宁市，民族语言称为“固尔扎”，几百年过去了，民间仍

\* “昭苏”之名取自“喇嘛昭六苏木”的简称；一说取自《礼记·乐记》“蛰虫昭苏”。笔者以为后者不免有附会之意。

\*\* “圣祐寺”之名，笔者取文献中最早在嘉庆十三年，钦赐寺名为准；现大多已流行称其为“圣佑庙”，不知其出处。

① 本文的伊犁河谷所涵盖的范围多指现在中国版图所辖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的一市八县，即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霍城县、尼勒克县、伊宁县和新源县。

② 西蒙古：一般指包括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等部，后来准噶尔部强盛，遂以其称代之。

③ 诺颜：蒙古语音译词，指“君，领主”之意。

保留这样的称呼)。在噶尔丹汗(巴图尔珲台吉六子,1676—1697在位)统治时,伊犁成为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藏传佛教文化兴盛、寺院集中的地方。当时伊犁河两岸建有两大寺院,北曰固尔扎(金顶寺,在今伊宁市东北郊喀尔墩乡)、南曰海努克(银顶寺,在今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遥相呼应、盛极一时。除了这两大寺院外,当时还建有很多的显密教院。准格尔汗国是在策旺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达到极盛,也是伊犁黄教寺院的兴盛期。

清王朝定鼎中原,乾隆帝统治中期最终把准格尔汗国纳入其版图。为了固土戍边,清政府从东北和内地调兵移民,并招集西蒙古余众及先前投附者逐渐形成满营、索伦、锡伯、察哈尔和厄鲁特等营。经常年战乱,伊犁河谷准噶尔汗国时期兴盛一时的藏传佛教寺院损毁殆尽;准格尔部众亦遭灭顶之灾。及至清政府收取余众组营(按八旗编制)戍边,其居地已不在伊犁中心地带:厄鲁特<sup>①</sup>营左翼上三旗牧地在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玛哈一带(现大部已在哈萨克斯坦境内,部分在昭苏县境内),右翼下五旗在伊犁东南部中天山西段,今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及新源县境内。厄鲁特营在当时各营中地位较特殊,它与其它各营一样披甲有银无粮(不像满营兵丁既有粮又有饷);并且它在乾隆中期组建之初就人多众广,除惠远老满营外,其人口位居其他四营之首。厄鲁特营也像其他各营官兵一样,担负着戍守卡伦、巡防台站等军事任务;除此,它还发挥其畜牧业特长,担负经营官办牧厂的重任,其养殖的牲畜数量也是各营之首,并且兼营少量农业以作补充。

当时,清政府以“佛教柔顺蒙古”,大力“推崇”藏传佛教,成为很多民族的共同信仰。伊犁底定,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当年就在绥定城东北建兴教寺,“内聚番僧”;五年后因其“规模湫隘”,又移建于惠远城(伊犁将军府所在地)东、伊犁河边,清帝赐名“普化寺”,后渐成为伊犁八旗各营的总寺。除普化寺外,后来又建厄鲁特营上三旗(主要由原准噶尔达什达瓦部的民众构成)的圣祐寺,下五旗(主要是战争中离散或为奴后被清廷赎回的原准噶尔民众组成)的崇寿寺;沙毕那尔<sup>②</sup>(主要是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大喇嘛罗卜藏丹增的属民)的广祐寺;察哈尔营(大多是由察哈尔八旗牧地多伦诺尔西迁的蒙古民众构成)左翼建有镇远寺,右翼有集福寺;锡伯营(主要由从东北西迁来的满洲锡伯部众构成)建有靖远寺,以及索伦营(主要由从东北西迁来的达斡尔、鄂伦春等民众构成)建有康远寺,这些都是清朝皇帝钦命的寺院。

当时,藏传佛教信仰在伊犁边疆军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官员也是主要宗教活动的参与者,民众更是热心积极。在许多卡伦(即哨所)也建有简易的寺庙,在清末锡伯营何耶尔·沃克津的“辉翻卡伦来信”<sup>③</sup>以及1862年俄国突厥学家B·B·拉德罗夫在伊犁河谷考察中所提到的博乐胡吉尔、霍尔果斯河谷的卡伦都有寺庙<sup>④</sup>;沃克津换防当天在辉翻卡伦寺庙礼拜神位,其主神就是被藏传佛教纳入其神灵体系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的战神关羽大将军。

清代伊犁河谷八大寺院存留至今的:一为锡伯营的靖远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境内),维修后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已没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坐寺喇嘛;另一座就是昭苏县的圣祐寺,依然是当地蒙古、汉、锡伯等民众的精神家园,有坐寺喇嘛为当地群

① 厄鲁特蒙古,是清代对西蒙古诸部的总称,清一统后,以其替代准噶尔之称。国外学者常常沿用突厥语族习惯,称之为卡尔梅克。厄鲁特余众也被称之为准噶尔蒙古的眼泪。

② “沙毕那尔”意为“徒弟们”。一般说,沙毕那尔是蒙古藏传佛教寺院的属民,他们需要为寺院放牧劳作、交纳租税、据付永正、张付新在《清代伊犁沙毕那尔营设置过程述评》(《吐鲁番研究》2008年第2期)中考证,清代伊犁沙毕那尔曾建立过营制。

③ 肖夫译“辉翻卡伦来信”,《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7—140页。

④ [俄]B·B·拉德罗夫著,佟玉泉译“克苏至固尔扎游记”,《伊犁地方志》2011年第2期,第87—110页。

众进行宗教服务。

2009年8月笔者利用假期对昭苏县圣祐寺进行实地考察,到县档案局、民族宗教事务局搜集资料,同时走访一些喇嘛和当地学者。在此基础上,笔者又查阅相关文献,现就圣祐寺的研究现状、历史沿革、布局组织和主要的宗教活动等进行了梳理,以飨读者。

## 一、有关圣祐寺的考察和研究

较早对圣祐寺进行考察并留有记录的是芬兰著名探险家马达汉(Carl Gustav Mannerheim, 1867—1951年)。1906—1908年间受俄军总参谋部指派到中国北部地区进行军事侦察;同时其接受“芬兰—乌戈尔学会”等委托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考察。马达汉在中国两年的考察中,横跨八省、留下1370多幅照片和珍贵记录。1907年4月4日至6月14日(俄历)间马达汉穿行于伊犁河谷,曾先后两次到圣祐寺,对当地民众信仰极为关注,留下较翔实的考察日记,对寺院状况、喇嘛、法事活动及蒙古族的宗教习俗都有记载;更可贵的是,他拍摄的寺院与喇嘛照片现已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国内对圣祐寺考察较晚,1982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和新疆大学历史系联合组成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其成员包括马大正、蔡家艺、巴赫、陈世良等队员),对新疆蒙古族地区进行了较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厄鲁特蒙古各部的历史、宗教等方面亦做过普查;1984年调查资料结成《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九辑)。<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伊犁从事统战工作的李稼多次参加宗教调研,对伊犁藏传佛教寺院及喇嘛等情况有所关注,发表《我所知道的伊犁喇嘛教情况》,<sup>②</sup>对圣祐寺解放前后到80年代初的寺院状况、宗教活动和喇嘛等都有所涉猎。

除上述资料,笔者在昭苏县所看到的众多涉及寺院和喇嘛的零散档案中,民族宗教事务局存有一份1989年7月由圣祐寺喇嘛集体(包括:乔古伦、克热甫、阿尔乌苏力等老喇嘛,调查时他们都已过世)提供,并由县科委仁钦整理的“边疆古建筑昭苏圣祐喇嘛昭先进材料”。<sup>③</sup>提供材料的这些喇嘛大都出生于20世纪初,见证了圣祐寺的兴衰;材料除简要介绍寺院历史、维修情况、重要的宗教活动、喇嘛风俗变化外,同时也记载喇嘛帮助困难群众的事迹和国内外参观寺院的情况。这个材料因由老喇嘛们提供,尤显珍贵。

在笔者关注伊犁河谷藏传佛教寺院的这些年,注意到锡伯营靖远寺因有清代官方档案,加上考察材料的补充,由清至民国间大喇嘛的世系已较清晰。圣祐寺在这方面的资料是欠缺的,只在喇嘛师徒的口头传述及民间资料中留下清末以来的简单记录。

在实地考察中,笔者了解到当地一些蒙古族学者,例如巴·巴音克希克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厄鲁特蒙古楚吴都克家族的后裔。多年来他对圣祐寺关注有加,利用地缘优势做了大量调查,用托忒蒙文撰成《新疆昭苏县“佛爷庙”<sup>④</sup>历史概况》<sup>⑤</sup>一文,较详尽介绍圣祐寺建筑过程、僧侣职务、大小经会、寺院财产及历史上有名的喇嘛等情况。这是笔者目前见到对圣祐寺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新疆宗教研究资料》(内部参考)第9辑,1984年12月。

② 李稼《我所知道的伊犁喇嘛教情况》,《伊犁文史资料》(第18辑),2002年,第212—215页。

③ 乔古伦,克热甫等喇嘛集体口述,仁钦整理“边疆古建筑昭苏圣祐喇嘛昭先进材料”(1989年7月7日),昭苏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目录号:2,案卷:4,第44—49页。

④ “佛爷庙”是蒙古族群众对圣祐寺的民间称呼,“佛爷”指圣祐寺供奉的主祭神:佛祖释迦牟尼。

⑤ 巴·巴音克希克“新疆昭苏县‘佛爷庙’历史概况”,《昭苏县蒙古族文化历史资料》(一)(托忒蒙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81—167。本文无汉译本,是笔者请新疆电台老干处的关巴先生翻译,译文有待进一步商榷的地方,现仅供参考。

用力最多的一位学者,其对民间资料搜集较多,但对官方文献关注较少。可惜作者早逝,家人正整理其留下的材料准备集结出版。此外还有塔·巴德玛整理《加木英·多尔吉喇嘛》和《旦德喇嘛》<sup>①</sup>的生平事迹;王劼也撰有《昭苏圣佑庙达喇嘛加木英·多尔吉生平简介》<sup>②</sup>一文。

综上,对圣祐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注的学者不多。仅就“圣祐寺”钦定之名已有多种转写;2001年圣祐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圣祐寺本身的历史价值而言,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是有必要的。

## 二、圣祐寺历史考述及译名商榷

文献中关于圣祐寺最早记载见于清代抄本《伊犁文档汇抄》:

嘉庆十三年,大学士将军松<sup>③</sup>咨明:额鲁特上三旗、下五旗并沙毕那儿人等各该游牧俱建盖庙宇,请赏庙号。每庙由部领度牒,添放闲散达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德木齐一名,住该游牧奉经。上三旗庙名:圣祐寺;下五旗庙名:崇寿寺……<sup>④</sup>

嘉庆十三年(1808),厄鲁特营左翼上三旗六苏木<sup>⑤</sup>所建庙宇钦定为“圣祐寺”。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位于昭苏县城西北军民巷8号的寺院是嘉庆年间修建的那座吗?

钦定圣祐寺名的第四年,湖南学政徐松被贬伊犁。在边疆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嘉庆二十四年其完成地理学名著《西域水道记》记有:

特克斯河又东流,格登水自北来入之。格登水二源,西源发达布逊淖尔南岸山,曰阿尔班水,南流数十里,经上三旗厄鲁特之喇嘛寺西。……其喇嘛寺在格登山北麓,阿尔班水经寺西。<sup>⑥</sup>

格登山位于昭苏县城以西60余公里,徐松在文中也注明格登水因山得名,其西源阿尔班水是特克斯河北岸十条支流中自东向西的最后一条支流,因“阿尔班”在蒙语中谓十数。现在的圣祐寺距文中记载的寺院有60多公里,可知这个寺院绝不是嘉庆皇帝钦名的那座。“阿尔班”也被写作“阿力奔”、“阿勒温”,昭苏历史上曾载有阿力奔庙和阿勒温庙,应该指同一个寺庙。据编纂过《昭苏县地名图志》的仁钦老师确认,清代的阿尔班水就是现在昭苏县西界、中哈边境的苏木拜河(“苏木拜”蒙语意为“庙所在地”),在格登山以北。

毋庸置疑,嘉庆年间厄鲁特上三旗第一次建的圣祐寺就是被蒙古族群众称为“阿力奔庙”或“阿勒温庙”;当时格登山以北,阿尔班水流域应该是上三旗的中心区域;按照当时的经济实力,六苏木民众不可能同时供养那么多寺,那么多寺名只是对圣祐寺的不同民间称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圣祐寺”之名当时乃至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在当地蒙古群众中流行,因为汉族移民及汉语使用在厄鲁特部是晚近的事情,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寺院使用更通俗的称呼;清政府宗教管理甚严,对寺院及喇嘛都登记造册,相应官方档案中,也找不到民间称呼。

1989年由仁钦整理的老喇嘛集体口述材料有这样的记录:

① 塔·巴德玛,“加明·多尔吉喇嘛”和“旦德喇嘛”,《昭苏县蒙古族文化历史资料》(一)(托忒蒙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3—275页和第276—281页。

② 王劼“昭苏圣佑庙达喇嘛加木英·多尔吉生平简介”,《伊犁文史资料》(第8辑),1992,第152—153页。

③ 指伊犁将军松筠。

④ (清)佚名辑“伊犁文档汇抄”,清抄本,《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3册)线装书局出版,2003年,第86页。

⑤ 苏木,蒙古语音译,原意是“箭”。清代用来称呼蒙古旗下一级军事、行政单位。厄鲁特营上三旗包括六个苏木,人口减少时,曾合为五个苏木。

⑥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5页。

在昭苏历史上中国西蒙古厄鲁特部落建修的十三个庙中,最后建的一所庙就是今存的圣祐喇嘛庙。<sup>①</sup>

材料中提到厄鲁特部建有13个寺院,应该是指准噶尔和清王朝统治时建立寺院的总数,还是指清时厄鲁特营各处所建寺庙兴建和移建的次数?厄鲁特民众中喇嘛们一直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人群,他们师徒间口口传承的资料大都传之有据。“厄鲁特”是清统治以后对准噶尔汗国余部的称呼,那么这个数字应指清时厄鲁特营各处所建寺院及逢动乱后移建的次数。厄鲁特营除左翼上三旗,右翼下五旗及沙毕纳尔都建有寺院。他们大都是准噶尔的部众,右翼下五旗所在的今特克斯县,在准噶尔汗国时曾是名僧咱雅班第达<sup>②</sup>属众“沙毕纳尔”所在地,1982年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调查中,当地建有“四个大喇嘛庙:呼图克图格根庙<sup>③</sup>(当时已毁)、巴乌庙(祭释迦牟尼的)、阿尔丹嘎不纠庙和额尔沁庙”<sup>④</sup>可见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有历史渊源的。并且右翼下五旗民众多于上三旗,他们的寺院也较多。

巴·巴音克希克先生在《新疆昭苏县“佛爷庙”历史概况》中也记有“胡木别勒寺、苏根寺、巴合勒克寺、仲嘎寺、乌尊布拉克寺、阿格牙孜寺、哈桑寺、格登寺、贡布寺、小洪纳海寺、库克乌逊寺、杭盖寺、夏拉秀古尔寺和大洪纳海寺”等14座,这些寺庙在地理分布上涵盖了厄鲁特营左、右翼全境;应该是老喇嘛所指的那些寺院,由于当地有准噶尔汗国的寺庙遗存,而使这些数字显得纷杂起来。就圣祐寺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从始建到最后一次移建文献中就出现过三次之多。

厄鲁特上三旗最初驻牧于特克斯河(伊犁河上游)、察林河及塔马哈河流域,最初的中心地带应在格登山以北,阿尔班水流域,此应为圣祐寺始建之地。但沙俄在中亚的迅速扩张打破了清帝国边疆的短暂平衡,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帝俄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特穆尔图诺尔及该湖以东的察林河、格根河、特克斯河水系上游的全部地区,上三旗的大部分牧地被俄国占领。”<sup>⑤</sup>上三旗驻牧中心内移已势在必行,接下来同治年间的维、回动乱,使厄鲁特民众损失惨重、流离失所。位于惠远城八旗各营总寺——普化寺亦遭大劫,“……东干人杀死了庙里所有的喇嘛,只有大喇嘛逃到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sup>⑥</sup>

圣祐寺同样也在劫难逃。曾参预征服中亚各汗国的俄国中将捷连季耶夫,利用大量官方文献与档案于1864年就开始撰写的《征服中亚史》(完成于1894年)中就记录了圣祐寺的那次劫难,当时俄国境内的一些部众也参预抢劫,

……很多人不愿失去到汉人和卡尔梅克人那里去发财的机会,他们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地方(例如从楚河彼岸)前往特克斯河和伊犁河一带,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阴暗的荒野密林里去寻找不幸的卡尔梅克人。

1864年12月初,多金人、谢基兹萨连人和萨雷巴格希人将苏木拜的佛教寺院抢劫一空,该寺院位于注入特克斯河的苏木拜河上。其庙宇及禅房均被烧毁,金、银、铜铸的佛像

① 乔古伦、克热甫等喇嘛集体口述,仁钦整理“边疆古建筑昭苏圣祐喇嘛昭先进材料”(1989年7月7日)昭苏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目录号:2,案卷:4,第44—49页。

② 咱雅班第达(1599—1662年),原名纳姆哈嘉木措,为和硕特部人,是四部首领拜巴噶斯的义子,代替其子到西藏为僧。其跟随达赖五世,诵经整整22年,获拉让巴格西学位(格鲁派一等学衔),后返回蒙古弘扬佛法。

③ “呼图克图格根”指的就是咱雅班第达,这是他的众多封号之一。

④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新疆宗教研究资料》(内部参考)第9辑,1984年12月。

⑤ 吐娜“厄鲁特营对伊犁地区的经济开发”,《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第67页。

⑥ 巴里善著,佟玉泉译“1864—1871年间伊犁农民暴动的回忆”,《伊犁文史》第27辑,2010年1月,第268页。

全被抢走,石膏佛像被打得粉碎,寺院里的人被打死或逃跑。数日后到该地的人所见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近三十个濒于死亡的受伤挨饿的老年妇女。<sup>①</sup>

其后,沙俄趁机侵占伊犁达十年之久。至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收回伊犁,沙俄又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又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厄鲁特原地不断受到侵蚀,被迫东移。清末随着生活稳定,人口增多,厄鲁特民众开始再次兴建寺院。

1907年4月8日(俄历),路经此地的马达汉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所走的路很不错。这条路自西南向东北走(约10—12俄里),可能把卡尔梅克人的古喇嘛寺素摩<sup>②</sup>(圣佑庙)与库热连接起来。……

库热喇嘛寺(圣佑庙)是十年前卡尔梅克人集资建造的。听住持说,原有的古寺叫素摩寺,三十年前被俄国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烧毁了。<sup>③</sup>

译者在素摩寺和库热喇嘛寺之后都括注的是圣佑庙。被俄国将军烧毁的寺庙位于大洪纳海(也是特克斯河的主要支流)河口,巴·巴音克希克也在文中记有此河口建有“佛爷庙”,被俄人烧毁一事。现在位于河口以北、昭苏县城西北的圣祐寺其前身所在地至此也就很清楚了。

据马氏记载向前推十年,应该是1898年左右,这和县档案资料所反映的圣祐寺交付使用时间吻合;资料表明:其始建时间是1884年,从北京请来建筑名师李照福等80名技师,由上三旗六苏木百姓集资,耗银十万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竣工交付使用。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后一次兴建、并保存至今的圣祐寺。其历史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代《昭苏县志》也记有:

清光绪十九年(1893)5月,厄鲁特营六苏木蒙古族民众,由于地处松拜河(苏木拜河)西岸阿力奔喇嘛庙被俄国割占,失去了宗教活动场所。因此,在玉克尔代组织领导下,集资修建圣祐庙。<sup>④</sup>

此记载提到圣祐寺(这里圣祐寺又以阿力奔的民间称呼出现)初建地和最后一次修建的时间,这两处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但由于官方档案的缺失,圣祐寺的历史依然是模糊的。

1982年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在昭苏县曾采访81岁的担达喇嘛,他说:“刚回来时,喇嘛庙毁了,喇嘛也散了。巴勒特高勒在巴勒特地方修了一座喇嘛庙,是用木头修的。一、二百年后,人口、牲畜都恢复了。后来六苏木和克列吉斯发生战争,庙毁掉了,于是把巴勒特庙和喀喇哈盖两个庙合盖成一座庙,就是现在的昭苏庙(蒙古库仑)。这是由才布加甫总管向北京要求,由北京派刘师傅来盖的庙。盖成已有九十五年了,在我出生以前十五年盖的。”<sup>⑤</sup>在老喇嘛口述传说里也只留下概括、模糊的记载,边疆生活的残酷与恶劣在一个寺庙的命运中就可见一斑。

综上,圣祐寺建于嘉庆十三年(1808)左右,位于格登山以北,苏木拜河流域,当时那里是厄鲁特营上三旗的活动中心;在同治动乱中首次为俄国境内的中亚部众所毁,后随厄鲁特部众

① [俄] 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二卷)北京:商务书馆,1983年,第一章,第11页。

② 素摩,马达汉在1707年5月2日的日记中记有“塔兰奇人叫做‘素箔’或‘素摩’,意思也是‘寺庙’或‘修道院’。”不知二者有没有联系。

③ [芬兰] 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页。

④ 元冬初,古昱方主编《昭苏县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5页。

⑤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编《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九辑(内部参考),1984年,第30页。担达喇嘛也被译作为“旦德尔”喇嘛。

流徙东迁，又建于大洪纳海河口，后为俄人所毁；光绪十年（1884）左右最后一次上三旗六苏木民众集资修建，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竣工使用，逐渐形成上三旗的中心。

在多次战乱迁移中，圣祐寺最早的匾额遗失，当后人根据蒙文之意往回汉译或由于记忆模糊，就写成“圣祐庙”、或“圣佑庙”了。从锡伯营靖远寺的题匾可知，当时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题写。圣祐寺的藏语对译是“吉金铃”，蒙语书面语称其为“博格达夏格松”，但当地的一些蒙古群众又称其为“博格达伊瓦克齐苏木”，由此不难知道为什么圣祐寺有那么多的名称了。

### 三、圣祐寺的布局及藏经

圣祐寺坐北朝南，有围墙环绕，原有照壁已砌入南墙。现只开东侧一大门。院内八座建筑布局对称，山门、前殿、大殿、后殿在中轴线上，东西还有两配殿和两个八角形双层双檐的钟鼓楼亭。因当年请的是北京师傅，其建筑采用中原传统汉式风格。大殿为寺院主体建筑，殿高17米，进深7间，平面呈正方形。整个占地面积1.1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09.74平方米。<sup>①</sup>据记载初建共有11个主体建筑，大殿两旁还有一个厨房和仓库，后殿后面还有一工作间，专门用来制作唐卡和佛像等。据现在的寺院主持山巴依尔说，县文物局新近发现一张寺院的老照片，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大出檐，高举折，陡屋顶，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之。工程精细，鎏金沥粉。巨柱擎起的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猛虎雄狮，金鹿麒麟，凤凰猕猴，千姿百态。大殿正壁还绘有二龙戏珠、凤凰比翼、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我国传统风格的壁画。……”<sup>②</sup>对于圣祐寺早先的这些生动形象描述，现在已被圣祐寺各种宣传材料多次引用。

经过多次维修的圣祐寺，古朴胜于雕琢，百余年的沧桑，更增加了庄严与厚重。在大殿二楼设一崭新毡房，最显金壁辉煌，主供释迦牟尼，各种祭器置于神坛之上。挂匾的廊檐下，早已空无一物，整个寺院静静矗立在群山中，似在静观人世的沧海变迁。据天山乡80多岁的吐吾顿（从小与弟弟一起进寺当喇嘛，1950年还俗）说，民国时匾额还在，寺院整个布局没有多大改变，原来东西南北墙都开有一门，为住在寺院周围的喇嘛出入提供方便。因为当时喇嘛不在寺院内住（比起内地一些大寺院，圣祐寺相对狭小），他们按六苏木所属在特定区域分别盖房或搭建木屋围住于寺院周围。民国间，寺院兴盛之际有喇嘛500多人。距离围墙四角500米处各建一白塔，为寺院真正界线。以前，虔诚的信徒到塔边下马，向着寺院磕三个头，礼毕，再到各自要请的喇嘛处。现紧挨东边围墙，紧靠大门外有房屋三间，组成品字形的院落。据现在喇嘛说，那是20世纪80年代政府为名医旦德尔巴图吾仁盖的医疗学校，有授课的教室、药房和诊所各一间。可惜旦德尔不久过世，医疗学校不了了之。现为三户喇嘛居家之处（现在寺里的喇嘛都可以成家）。

从大门开始有两排红漆圆木廊柱一直通到佛坛，……。佛坛上挂了一些花花绿绿的旌旗状的画（唐卡），佛坛前供奉着盛满米和水的盂碗和金属盆、盆里冒着火苗。引人注目的是，佛坛前和右边还摆放着钹、鼓、和大小不同的喇叭，……。廊柱之间摆放着几张矮矮的长板凳，两边靠墙的地方则摆着一排铺毡毯的无靠手椅子。椅子上放着喇嘛们的僧帽、袈裟……<sup>③</sup>

① 有关圣祐寺占地及建筑面积，有多种数据，笔者取昭苏县档案局“自治区政府、文化厅等关于昭苏县圣祐庙维修、移交、推荐的材料”中的数据。

② 伊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伊犁风物》，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118页。

③ [芬兰] 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寺里曾藏有大量蒙文、藏文经书和其它书籍,其中有《甘珠尔》、《丹珠尔》等大型经书;《塔尔布确木布》、《乃门盟格图》等独立成章的中型经书;也有《医学四基础》等医药书,藏文历书,祭祀、占卜方面的书;以及《太子的秘密》等故事书和《江格尔》等英雄史诗。这些流传有年的典籍,在文革初大都被付之一炬,只有少数私人收藏被保存下来。现在念的经大多是《甘珠尔》、《丹珠尔》(寺里现存不全),山巴依尔主持每年去青海塔尔寺请回一些经书和宗教用品。

#### 四、圣祐寺的组织规模及喇嘛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就在绥定城建立兴教寺,后迁至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更名为普化寺。长期战乱,经济疲敝,最初各营还无力建造自己的寺院。普化寺的喇嘛一年中有五至七个月在厄鲁特营生活,文献中记有:

(乾隆年间)普化寺居住喇嘛……每年四月间,该喇嘛等前赴厄鲁特,游牧、避暑、念经,至八月以内回普化寺居住。<sup>①</sup>

(嘉庆年间)普化寺居住喇嘛……每年三月间该喇嘛等前往厄鲁特游牧地方,念经至九月间,旋回普化寺居住。<sup>②</sup>

普化寺建立之初“内聚番僧三十二众”,五年之后,“僧众倍增”,<sup>③</sup>这些“番僧”就是蒙古喇嘛。准噶尔汗国时期伊犁河两岸以金顶寺、银顶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曾盛极一时,云集了大量的西蒙古喇嘛,残酷的战争与祸乱使寺院毁于一旦,喇嘛离散。当和平重新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喇嘛又返回寺院,所以人数增加很快。乾隆末年,伊犁喇嘛已达1181名;到嘉庆十二年左右只察哈尔与厄鲁特两营官方在档的喇嘛就有2855名。

清政府宗教管理严密有度,从派专员管理到喇嘛任命、普通喇嘛管理都形成一定制度。最初普化寺的堪布和苏拉喇嘛由中央派任,三年一任(后为五年一任),各一名;后逐渐改由当地喇嘛中补放;寺内喇嘛管理层还有格斯贵、德木齐,官方都发有一定俸禄;普通的喇嘛分为食钱粮喇嘛和不食钱粮的闲散喇嘛。

圣祐寺在嘉庆十三年清帝赐庙号的当年,

由部领度牒,添放:闲散达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德木齐一名,住该游牧奉经。<sup>④</sup>

随着厄鲁特上三旗民众的增加,宗教服务的需求也相应增长,所以在寺喇嘛数和平时增加相对较快。圣祐寺在实际运作中组织也较繁杂;笔者在参考巴·巴音克希克先生的《新疆昭苏县“佛爷庙”历史概况》和本人调查整理出清末以来圣祐寺喇嘛和职务,现述如下:

**堪布** 在圣祐寺的组织中实最初并没有此设置。清政府由京差来的堪布就在普化寺,他是伊犁藏传佛教界级别最高的宗教领袖。清末民国间(1889—1950)由圣祐寺苏拉喇嘛升为堪布的有两位:一是金毕堪布(镶黄旗阿合苏木人);另一个是罗拉堪布,曾任达喇嘛,精通佛学,法术高明。1940年代被盛世才害死。

**苏拉喇嘛** 也称副堪布,有代替堪布处理事物的权力,并可晋升为堪布;普化寺曾有苏拉喇

① 清·永保《总统伊犁事宜》,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稀见史料汇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229页。

② 清·佚名《伊犁文档汇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3册,北京:线装书局出版2003年,第88页。

③ 清格琿额纂《伊江汇览》,墨香斋本,乾隆四十年,第24—25页。

④ 清·佚名《伊犁文档汇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3册,北京:线装书局出版2003年,第86页。



嘛一名，其他寺院初无此职；清末圣祐寺有此职位，担任过苏拉喇嘛的有：金毕、罗拉和英宁等喇嘛。

**达喇嘛** 也叫首席喇嘛，是寺院负总责的主事喇嘛。圣祐寺有记载的历任达喇嘛是：德金（生卒年不详）、桑吉（1889—1895年）、博（1896—1904年）、松嘎（1905—1909年）、金毕（1910—1913年）、那木卡（1914—1915年）、金布（1916—1920年）、江布（1921—1926年）、罗拉（1927—1932年）、苏（1932—1935年）、金宁（1936—1937年）、通古木特（1938—1941年）、加木英（1942—1944年）和英宁（1945—1949年）<sup>①</sup>等。其中，加木英·多尔吉达喇嘛，生于1897年，卒于1970年。13岁拜松俄伦为师，18岁做格塔勒（喇嘛弟子），后历任羌布、皮恰其（秘书）、阿尔胡格斯贵（念经时的监督员），1951年升为金肯德木齐（即执法官），1956年经尼勒克县江布苏堪布的任命担任圣祐寺的达喇嘛（先后两次担任此职）。解放后加木英达喇嘛积极支持党的各项政策与社会主义建设，多次捐款捐物；1953—1966年间被选为政协常委、地区和自治区政协委员；文革期间被遣回天山乡参加劳动。1970年12月病故。

**巴图吾仁** 蒙语中有“长久的职务”之意，可代替大喇嘛管理寺院经会和其他事物，共有四位。大喇嘛编制短缺时可从中选补，担任巴图吾仁必须精通佛教教理和规章制度，有些还精通医术。担任过此职的有：莫鲁木、罗左诺如甫、达木恰、阿尔布克以及旦德尔等，其中旦德儿以医术高明闻名于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旦德儿生于托嘎苏木牧民塔勒格尔家，俗名叫才毕德尔。13岁时身患重病，被在昭苏行医的西藏喇嘛帕仁布治好，后随其赴西藏学习10年，25岁和师父返回家乡。在西藏曾获普及黄教的“确尼真旦德尔”称号，后来群众以号代名，称他为旦德尔。1935年经堪布批准晋升为巴图吾仁，任职期间，依旧长期钻研医学，不辞辛劳为群众解除各种疑难杂症。解放后，旦德尔积极支持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坚持以高超的医术服务于一方百姓，为缺医少药的边疆民众开辟一片福荫，赢得群众的尊重并拥有极高声望。1975年旦德尔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医疗卫生系统名医参观研讨团，在北京给周总理号过脉。旦德尔生前曾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首届代表和理事会常务理事等职，1988年因病在家过世，享年84岁。

**格斯贵** 主要负责寺院经会，处理违反寺规者，裁决僧侣诉讼。格斯贵分为正、副和阿尔胡三个级别。曾担任过正格斯贵的有：松古如甫、锡里甫、江布、旦真、巴勒登、皮里吉、皮日拉和加木苏等喇嘛。有名的格斯贵有罗鲁甫，他是镶黄旗诺苏木人，精通占卜和气象学，据说其可预测出三、五年的天气预报。解放后，被请到昭苏县气象局工作，直至过世。

**德木齐** 是由官方指派，负责寺庙所有收入支出的财政等事务，也分为正、副和阿尔胡三个级别；德木齐可以参加商讨召开经文大会的主持会议。曾任过正德木齐的有：塔亚、锡里甫、桑吉、通古木特、加木英、吕日甫、江布、莫鲁木、巴勒登和确格罗甫等喇嘛。其中塔亚生于1830年，7岁时在大洪纳海庙（圣祐寺，后为俄人所毁）当格恰，最后一次建圣祐寺时任阿尔胡德木齐，后升为正职。1910年去世，他的出葬仪式十分隆重，用青砖立塔，念七天超渡经。著名的正德木齐还有巴勒登（1898—1981年），他以治疗胃病和外科疾病而出名。

**翁扎特** 也称古木札特，其职是领读经文。翁扎特必须精通经书，也分正、副和阿尔胡三个级别。任过此职的有：莫鲁木、巴勒登、乔鲁图木、旦赞、罗布真和乔登等喇嘛。

**尼尔巴** 分为文书、仓库两种尼尔巴，也有正、副和阿尔胡三个级别。正、副尼尔巴住在寺

① 这些有任职时间的达喇嘛是笔者参考：特尔蒙克、策吾克、巴音克西克写的《昭苏县上三旗六苏木乌库尔岱（领队大臣）任职情况》，其·光布加甫主编《伊犁文史资料·蒙古专辑》（托忒蒙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39—650页。笔者请曾在昭苏县科委工作的仁钦老师翻译。

院负责登记财产,有六个阿尔胡尼尔巴各负责一个苏木,登记其所交财产、牲畜和其他物品,再逐级上报。

**羌布** 负责用面粉、油脂捏各种供品,并绘制佛教图画等宗教艺术品。比羌布高一级的是夏布尔楞,他的技艺更高、更精湛。圣祐寺最后一个夏布尔楞叫做更登,1949年去了尼勒克县的寺院。

**才布尔齐** 是寺院经会期间喇嘛们的炊事员,各种食品原料每天向仓库尼尔巴领取。

**达木勒** 负责某一项寺院财产的喇嘛,如金银达木勒、专门经会达木勒、食品达木勒、畜群达木勒等。克里甫是其中有名的达木勒之一,他生于1904年,最初给塔亚当徒弟;1952年参加少数民族代表团赴北京,他是寺里最后金银达木勒,1991年去世,享年87岁。克里甫喇嘛是现任主持山巴依尔的叔叔。

**格西(格布西)** 藏语“格威西联”的简称,意为“善知识”。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的学位,喇嘛按顺序学完必修的经典后,可以考取不同等级的格西学位;寺院中格西参与培养徒弟和授职称等工作。确鲁木格布西,生于1902年,阿拉善人,1973年过世。

**格林** 是授于最忠诚于佛教戒律和规章制度的喇嘛称号。

**格苏勒** 也称格粗勒,是从徒弟们当中选出勤于学习、聪明、老实的忠厚者,起誓当喇嘛。格苏勒是当格林的前提,有着七戒。

**杜固齐** 是给大喇嘛穿衣服,布置经会座位,服侍大喇嘛的职务。

**更格** 精通经文经书、医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老喇嘛。

**格格** 对刚进寺院,住在某个喇嘛家向其学习藏文,同时做些家务杂活的人的称呼。他们除了向师傅学习经文外,还无权参加经会。

以上大致是圣祐寺组织和一些喇嘛的情况。

对于清末圣祐寺的喇嘛来源及其规模,马达汉在其考察中同样留下了记录:

卡尔梅克人中看来没有规定,每个家庭的第三个男孩必须当喇嘛,但却很普遍,只要有二个或更多的男孩,那么其中一个男孩就会在喇嘛寺受教育。在信徒们的眼中,喇嘛享有莫大的尊敬,如果喇嘛长途跋涉到拉萨朝圣,那么他受人尊敬的程度更甚。苏尔尕苏木(六苏木)<sup>①</sup>的5000牧户中有约500名喇嘛。在喇嘛寺受教育的男孩,平时为喇嘛服务,只有在空闲时候才叫他们念书。<sup>②</sup>

圣祐寺自重建之后,发展很快。清末至民国年间已有喇嘛500多名,解放后,这一状况发生很大变化。昭苏县档案记有:

至57年全县只有喇嘛86名,比解放初原有的583名下降了85%。59年宗教改革至今只剩下格伦(格林)以上的喇嘛27名<sup>③</sup>

解放后大部分喇嘛还俗。20世纪80年代初,圣祐寺逐渐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1986年在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留有档案的喇嘛11人,有名医旦德尔喇嘛(当时为县政协副主席,喇嘛庙管理小组组长)、克里甫(生于1904年,当时为县政协委员,喇嘛庙管理小组副组长)、格里克(生于1913年)、阿吾鲁苏勒(生于1918年,当时为喇嘛庙管理小组副组长)、干丁(生于1921年)、绰古龙(生于1931年)、罗拉(生于1922年)、多奴尔(生于1937年)、巴里几尔、托布丁和

① 是指厄鲁特营上三旗。

② [芬兰] 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③ 昭苏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4;案卷号:49;第104—111页。

东尕等喇嘛。<sup>①</sup>现在,圣祐寺的主持是生于1971年的山巴依尔,他于1987—1990年在内蒙古包头市五当召佛教学校学习。其他喇嘛还有阿木尔、欧亚、桑杰、尼木努尔、那木吉力、巴依尔塔、巴特蒙克等共8位喇嘛,每月轮流值班,为群众进行宗教服务。

## 五、圣祐寺经济来源和主要宗教活动

圣祐寺的各项开支是依靠广大虔诚的厄鲁特民众供奉。乃至圣祐寺最后一次筹建,也是上三旗群众捐款捐物的产物。当时厄鲁特民众有牲畜的捐牲畜,无牲畜的出劳力,总计花了十万两白银。

寺里的财产分为专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两种,都是以信徒自愿捐献和以公摊派两种形式形成的。寺中有“博格达的仓”、“班禅的仓”和“玛尔沁博木布拉的仓”是分别设立的,有专门的达木勒按年月登记造册,这几个仓的财产很多,解放前后还有十几群牲畜。

寺里的集体财产,是按经会用品分类存放,各大经会也建有仓,都专款专用。这些财产来源大都向民众公摊,据巴·巴音克希克的调查,当时每户每年捐一头奶牛(带犊)、一匹马、一头犏牛、一匹骡马(带驹子)、64公斤面粉、一块茶叶、十斤盐和半羊肚子酥油。不难看出,当时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负担是沉重的。

除此之外,寺院还拥有天然的继承权。马达汉在考察中也记有:

喇嘛寺里积累的财产不少。除了大量自愿捐献的以外,寺院对所有卡尔梅克人死后的财产都有继承权。寺院征收的这部分产业最高达到50%,但如果是穷人的话,也可以进行些减免。寺院的所有财产,每年拿出一定比例,按尊卑差别分配给喇嘛们。喇嘛死后,他的一半财产交给家族,另一半上交到拉萨。<sup>②</sup>

县档案局现存1953年4月24日县统战部写的《关于班禅尔德尼在昭苏财产状况的报告》记有牲畜:马900匹;牛130头;羊1000只;驼15个。这是早年来自西藏的拨热陶力哈和尚住梯等喇嘛动员当地群众自愿捐献的。

1957年由正达木勒克里甫、秘书达尔加把几个仓财产交给昭苏县第一人民公社。1963年7月,圣祐寺向县人民银行出售金银器皿等文物,折合人民币1765元。全部上交县财政局。

圣祐寺的宗教活动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寺的主祭神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建寺之初由西藏请来,老百姓称之为“佛爷大师”),此外供奉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还有玛格哈拉佛及其它神。寺里的宗教活动包括一些宗教节庆法会,历史阶段不同其主要内容也有所变动。

清朝统治时,对宗教管理与控制较严,反映在主要经会上包括皇帝生日(万寿节)时诵经七天,皇太后生日时诵经七天,每年十二月二十八号喇嘛等演跳布札<sup>③</sup>。

清末民国年间,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经会内容也日渐丰富。除了每天早、中、晚念三次经(先念宗喀巴赞词,再念经)外,还有各种宗教节庆法会(按照藏历):

正月初一,拜年。

① 昭苏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1;第19—41页。

②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③ (清)佚名辑《伊犁文档汇抄》,清抄本,《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3册)》,线装书局出版,2003年,第89页。另“布札”,藏语称“恶鬼”,此节也叫打鬼或跳神节。喇嘛教习俗,在宗教节日里喇嘛装扮成神佛魔鬼等,诵经跳舞,据说是为了驱除邪气,有除旧迎新之意。

正月初十五，大祈愿会（“麦德尔经会”）。麦德尔节是纪念弥勒佛的节日，宗教界认为正月十五是神佛大师宗教学业结束的一天，正月十六是麦德尔佛主持教学的一天，为了把佛教发扬光大，就把正月十五这一天作为麦德尔佛诞辰的日子。

四月初一至十六，永纳<sup>①</sup>经会，参加者是佛教的俗家弟子。

四月十五日，年齐特经会，是由西藏的四月祈愿大法会演变来的。四月法会，藏语为“德钦松宗”，意为三重节。藏历四月十五日，是释迦牟尼诞生、成佛和涅槃三大行迹纪念日。这个季节正是昭苏“草木生长，万物欣欣向荣”，蒙古族群众齐聚圣祐寺朝拜礼佛。次日按各苏木为单位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比赛，此经会遂演变成当地群众的娱乐节日。

六月初四，大法会，释迦开始传法纪念日。

七月一号至八月十五号，雅依里经会，念经45天。主要念“甘珠尔”、“丹珠尔”等大型经书。

十月廿五日，祖拉节，由宗喀巴去世纪念日演变而来。晚上家家点灯，每家每户在外堆雪，上面插上点燃芨芨草做成的火炬。每家互访喝祖拉节茶，吃饭娱乐。

十二月廿一至廿九日，古德尔经会，由演跳布扎的跳神节演变而来。（圣祐寺无假面具），从半夜开始念经，请护法神。

现今，由于寺内喇嘛人数少，值班喇嘛只念早经。每年也只举行麦德尔经会、年齐特经会和过祖拉节。

## 结 语

与当时伊犁锡伯营建的靖远寺相比，他们早期用国语（满语）诵经，与伊犁与西藏的佛教界联系较少。而伊犁的蒙古族早在准噶尔汗国时就与西藏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当时内齐托音和咱雅班第达等一些著名的黄教僧人在年轻时都曾被送到西藏学佛，跟随达赖、班禅等诵经修法。清王朝统一西域后，加强宗教管理，因为历史原因伊犁的藏传佛教寺院没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转世体系）。但厄鲁特营宗教界与青藏一直保持着联系。

圣祐寺最后一次建造时，其中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派出僧俗两个代表团（前提是清政府已批准建寺）：俗人代表赴京请建工人员；僧人代表赶赴西藏取得建庙批示，并请回经书和主祭的神佛。

刚进寺院的格恰，首先学的就是藏文，喇嘛们念的经是藏文经，至今如此。西藏的喇嘛有时会来厄鲁特营上三旗，例如旦德尔的师傅帕仁布就是来自西藏。解放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分别于1962年到伊宁，1984年视察昭苏，对当地群众震动很大。但更多的是圣祐寺的喇嘛到西藏或青海寺院学习，除了旦德尔巴图吾仁，党布达木勒曾在拉萨学经12年；现在圣祐寺的主持山巴依尔每年都赴青海塔尔寺，他的几个徒弟也在青海的寺院学习；欧亚去拉萨朝拜过，他的两个小徒弟在塔尔寺学习。百余年来，圣祐寺经受了风霜雨雪，仍然屹立在大洪纳河畔，为人们静官守着一方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黄夏年）

<sup>①</sup> “永纳”是圣地之义。